

# 场域变迁与规则重构: 新生代农民工 人际交往的微观机理

■ 张红霞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在文化变迁与场域变革的现实语境中,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微观逻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社会成员互动规则的流变性走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变迁样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中传统关系的疏离与弱化,呈现了流动图景中儒家伦理对人际交往规则仍有流变性影响,微观生活环境中惯习的延续使得传统交往规则不断被重构与再生产。在城镇化诉求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陌生人社会不仅需要形成与现代经济形式相适应的人际交往秩序,而且需要用现代陌生人伦理指引这一群体形成平等、尊重、信任的人际交往习惯,更需要突破因原有地缘、血缘认同而形成的情感偏向。

**【关键词】**场域变迁 规则重构 新生代农民工 人际交往 微观机理

##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关系既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基础,又与中国的文化伦理、组织形态紧密相连<sup>[1]</sup>。与西方普遍主义的关系类型不同,帕森斯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sup>[2]</sup>。一些学者从文化脉络角度梳理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伦”不仅有儒家所倡导的规范社会关系之意,而且也有其社会原理性特征,“五伦”说明了社会关系的条理、类别与秩序<sup>[3]</sup>。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一,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概念,以此说明中西社会的不同。阎云翔认为,“差序格局”不仅从纵向角度说明了社会秩序中“序”的等级性,而且暗含了社会个体的“差序人格”,也说明了人与人交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即“伦”<sup>[4]</sup>。在人际关系的层次上,一些学者认为差序格局是指个体与其周围不同的人相处的规则,中国人就是在维系这个“差序格局”和遵循其所要求的“一套关系”中被认可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sup>[5]</sup>。关于差序格局的现代转向,当前“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成为学者的共识。“差序格局”虽然同契约社会与法治理念完全对立,但是却渗透于社会领域中,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张红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城乡社会治理、人口城镇化、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实践问题与创新路径研究”(课题编号:HB18SH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瓦解了其道德性,重构了基于特殊主义的情感偏向,演化为唯利是图的新差序格局<sup>[6]</sup>。

在社会流动日趋加速的今天,现代化变迁不断深入,市场化脉动持续增强,个体化与异质性日益显现,社会关系的发生场域已经与历史语境有了极大差异,儒家伦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变得弱化与无序,以差序格局为表征的社会关系特征有了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变迁与流动性变革的代表性群体,其人际交往的微观逻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社会成员互动规则的流变性走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认识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变迁样貌,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具有现实意义。城镇化变迁所引发的流动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仅经历转型中的农村生活实践,而且使得这一群体深嵌于陌生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多重的经历与多维的动态场域不断形塑着这一群体的人际交往现实。从群体特征上看,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抹去农村社会的烙印,同时也被赋予了现代城市的理性特征,浓缩了中国现代性的多重表征。作为城镇化潜在的未来城镇居民,显示了城镇未来新增人口的特点,同时这一群体也是中国青年中数量极为庞大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机理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 二、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结构背景与微观动力

在社会学的经典论述中,布迪厄提出的“场域”与“惯习”是解释人类行动的核心概念。布迪厄认为,“条件制约与特定的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惯习。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sup>[7]</sup>。惯习显示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系统的影响,在惯习的支配下,个体行为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sup>[8]</sup>。场域是行动者实践的空间,是动态的、流动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信息沟通与互动改变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资源。生活场域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行动起着重要作用的并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所呈现出的复杂社会力量和诸多因素的集合体。这种客观场域的变迁既包括现代化发展引发的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的变化,也体现了流动与变革时代新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更展现了在宏观社会环境中原有文化习俗与现代性的交织。

### (一) 流动时代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中的场域变迁:传统关系的疏离与弱化

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集合了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旧制度与新结构、农民身份与职业工人等多种矛盾交织与冲突的特征,反映了城乡变革与时代变迁的特殊样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时代,成长于城乡流动加速的新时期。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看,这一群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长于城市,在农村生活经历较少,童年时期作为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第二类是出生与成长均在农村,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城市务工,作为留守儿童在农村成长,但没有务农经历,在农村接受学校教育,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且后来在城市务工、生活。第三类是出生与成长均在农村,童年时期随父母在农村生活,有务农经历且长大后来城市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中国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去传统化、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成为社会成员的新诉求。由于市场经济的介入与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强,社会成员自主性凸显,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下降,在契约、平等的基础上,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增多。地域性、血缘性、情感性是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突出特征,而在现代社会,社会关系呈现陌生性、松散性、理性化、契约性等典型特征。在城乡二元格局下,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农村地区大多经济比较落后,从调查来看,观念的传统性、社会关系的先赋性、思维的理性化、价值观的多元性在农村社会呈现出复杂的表征。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流动性增强、现代性凸显的社会中,伴随着城乡

之间的流动与市场机制的介入,各种传统社会关系的连续性与长期性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新生代农民工对血缘关系的认知也发生了一定转变,暂时性、契约性等社会关系新理念进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场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民工潮,留守或流动成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印记。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与父母的聚少离多中度过成长期。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0-17岁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人,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21.72%<sup>[9]</sup>。目前,这些留守儿童大部分已进入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是培育社会成员健全人格与亲密关系的重要场所,在亲子分离、父母缺席的成长环境中,在血缘关系成为符号的生活经历中,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失去了对家庭归属以及父母亲情的依赖感,也动摇了传统血缘关系产生的现实基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作为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2000-2005年间,17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的规模从1982万增加到2533万<sup>[10]</sup>,父母的迁移并未给流动儿童的成长带来实质性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父母打工的忙碌、城市寄居的孤独、悉心照顾的缺失、与市民的隔阂与距离、频繁流动的经历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既隔阂了血缘亲情,又失去了稳定的朋辈群体,这不仅给他们的人际交往带来诸多障碍,而且也影响了他们安全、稳定的人际交往预期与情感归属。2010年,我国0-17岁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已达9683万,其中接近205.7万的留守儿童处于独居状态<sup>[11]</sup>。拆分式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与孤独的成长状态不仅挑战着传统儒家伦理支撑下的家庭代际秩序,而且在某些方面正在颠覆着留守、流动儿童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知。与此同时,亲缘关系并未完全衰落,抚养义务的强调、经济支持的链接、传统伦理的恪守、代际责任的灌输仍是代际传递的纽带。但是成长中亲情的缺席、代际分离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学校教育对子代独立人格的培育都与父辈的代际预期相背离,最终导致父母权威弱化、传统关系疏离、亲情关系淡化。

## (二) 流动图景中儒家伦理的流变性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伦”与衍生于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差序格局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维持社会基层交往秩序的基本规则。儒家伦理以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基础,扩展到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以伦理本位为起点,儒家伦理核心观点和法则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之上。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是最基本的伦理分析尺度和单位,据此而产生了关于人与国家社会、人与君亲师友以及人与法理情理的基本思想主张和理论框架<sup>[12]</sup>。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是诸多传统社会的特点,但是差等的次序与伦理规范的制约,却是儒家伦理的特征之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地缘性共同体在社会成员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如果把差序格局看作是同心圆,最中心的是亲属关系,之后是邻居、朋友等熟人关系。在差序格局中,血缘关系是首要关系,由此有了亲疏、有了远近<sup>[13]</sup>。在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里,在亲疏远近不同的社会联系中,不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道德作为“序”,与亲子、同胞相配的是“孝悌”,而与朋友相配的则是“忠信”。人们的互动逻辑更多地被道德要素制约着,与差序格局共同形成了有差等的次序<sup>[14]</sup>。

儒家伦理约束下的人际交往秩序不是自在的文化,而是同生产情境与社会生活诉求相一致的人类合作策略。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图景与城市打工的生存境遇中,一方面,现代化浪潮下传统儒家伦理正在遭遇观念与行为上的撼动与弱化;另一方面,基于现代契约与平等的现代人际交往方式并未完全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缺乏生存竞争力的城市环境中不得不寻求传统儒家伦理秩序下生存权益的最大化。儒家伦理作为融观念性与策略性为一体的人际交往秩序,渗透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再生产模式中。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生

存能力欠缺、交往对象有限、社会地位边缘化等特征显示了这一群体脆弱的生存境遇,也注定了这一群体在人际交往中难以形成现代、平等、自由与契约式的交往情境。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与陌生人交往的无助以及被市民歧视是传统社会关系不断被强化所导致,那么孤立无援与边缘化的生存境遇则进一步重塑了传统人际交往秩序。在陌生人充斥的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底层就业的现实、生存资本的短缺、难以融入的城市环境、抹不掉的边缘人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群体同城市居民平等交往并获得正式认可的可能性极小,狭小的就业范围与有限的知识能力注定了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困难境遇。基于生存需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中不断重构着血缘、地缘关系,并依赖这种关系延续传统儒家伦理的部分规则,由此熟人社会的逻辑顺理成章地生成,部分儒家伦理以新的方式得以重建与延续。儒家伦理虽然在现代化变迁中遭遇了现代文明的冲击,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中,儒家伦理仍以多种形式或明或暗地出现在其行为的脉络中,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模式与个体的价值信仰。

### (三) 微观生活环境中惯习的重塑与延续

“惯习”作为行为的倾向系统是历史的产物,它确保了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的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sup>[15]</sup>。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时期的社会场域集结了传统的社会力量,实践中的亲身经历和父辈的言传身教都进一步加深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熟人关系规则的认知。虽然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催生了现代交往诉求,但是生活场景的熟人关系链接与微观环境中传统交往习俗的影响却进一步形塑了新生代农民工传统熟人社会交往惯习,强化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规则,最终通过观念灌输、行为影响、实践强化等一系列形式与过程,儒家伦理支撑下的熟人社会交往规则成为具有现代诉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倾向系统。既往经验最终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智结构中,不管是身处农村还是远居城市,这些熟人社会形成的人际交往规则都以“惯习”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陌生人的社会中引领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行为,最终再造原有的规则。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持续流动的经历不断解构着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造成了这一群体个体化的生存模式、家庭离散化的生活现实、去地域化的认同状态,但是在离乡与留城的多重生活纠葛中,在传统伦理与现代陌生人逻辑的激烈博弈中,在与现代社会交往规则的冲突中,成长场域中形成的带有儒家伦理印记的熟人社会交往惯习得以延续与重构。这种惯习一旦生成便成为一种行为倾向系统,并通过各种方式再造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行为,不论是身处现代化的科层组织还是居于陌生人的交往空间,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出来。

## 三、流动图景中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实践与逻辑

儒家伦理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历史的脉络中不断演化并被重新解读。作为成长在现代化变迁与市场化变革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人际交往场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冲突、陌生与异质纠缠、理性诉求与传统归属交织等诸多特征。在城市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呈现出复杂的逻辑走向。

### (一) 城市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与陌生人交往的实践与规则

现代城市社会是由异质性与陌生性个体组成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更多是建立在一致的契约认同、现代规则内化、个体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在西方社会,

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般是通过契约、宽容和允许以及“冷漠的尊重”等纽带连接起来的,法制—责任模式成为陌生人社会价值整合的重要机制,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理性驱动的利益”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法制成为维系陌生人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sup>[16]</sup>。陌生人与熟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成员之间的交往次数与频率,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在农业社会中,邻里可能会由于矛盾而断绝交往,但是却无法改变他们的熟人性质。在工业社会中,商人之间的频繁交往也不一定说明两者是熟人。在人际交往中,熟人社会之间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具有情感的习俗性信任。在陌生人社会中,需要的是一种基于契约与法制的具有理性特征的契约性信任<sup>[17]</sup>。以宗教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在科层制度的基本结构中,普遍主义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道德义务在规则和实践层面都适用于所有人<sup>[18]</sup>。

流动与漂泊并不能从根本上击碎或颠覆社会成员集群与交往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也是一个重构人际交往网络与交往逻辑的过程。在儒家伦理的社会秩序中,缺少对陌生人的关注,更缺乏对陌生人道德秩序的引领。新生代农民工身处陌生人的城市社会,远离亲缘、地缘关系,他们的交往对象异质而多元,与乡村社会不同,城市社会交往场域的主体选择性更强。新生代农民工与陌生人交往,这里的陌生人更多地是指除具有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等传统关系之外的互动对象,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同事、松散的朋友圈子等。一些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关系中仍具有乡土性特点,受认知结构和惯习的影响复制与移植着原生性的社会关系,在陌生人社会中再造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老乡、工友等社会关系明显具有情感归属特征,缺乏理性与规范。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与工作世界里,虽然已经建立了市场规范、法律规则,且这些规则也给予了社会成员平等交往、一视同仁的规范指引,但是可以发现,普遍主义的关系原则并未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实践中。身处开放的社会交往场域,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仍具有强烈的内倾性,交往对象的同质性特征突出。受原有惯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生存利益的诉求,在陌生人社会中既缺少与陌生人交往的理性认知,也缺乏对契约与规则的认同,更缺乏平等独立的交往行动。信任是现代陌生人交往的基础,规则是现代人际交往的秩序核心。受认知与传统惯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与陌生人的交往行动中,以情感认同代替理性分析,以熟人逻辑代替陌生人契约。传统儒家伦理以亲属关系构造社会关系秩序,规则依关系的远近而不同。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带有工具理性特征,但是这种工具理性却对熟人关系有着特定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与陌生人交往中以熟人逻辑移植正式规则、以特殊主义取代普遍契约、以情感逻辑忽视理性制约。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差,部分人际关系随时会因地域变更和岗位调整而中断。在这样的交往场景中,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对陌生人的信任,更缺乏对陌生人的道德。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生活特点、不稳定的关系状态,欺骗、不信任等行为在与陌生人交往中普遍存在,各种越轨行为也时有发生。新生代农民工在与陌生人交往中往往缺乏公平正义的理念,认为“不认识,没必要顾及太多”。既缺乏对陌生人的关照,更缺乏对陌生人的宽容与责任意识。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陌生人经济,基于契约交换逻辑,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主要依靠理性分工与协作。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陌生人社会中缺乏独立意识,仍然依赖熟人关系路径寻求庇护,倚重情感认同寻求归属感,依靠熟人规则获得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缺乏普遍道德的人际交往状态不仅大大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成本,也进一步恶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环境。

## (二) 流动图景中新生代农民工熟人交往的实践与逻辑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中流动与留守的经历造成了亲情关系的淡化,生活场域中现代文明

的冲击催生了这一群体对个体独立的诉求,不停变动的工作场所导致了亲缘关系的空间拆分,个体化的社会潮流引发传统关系链接的断裂,但是在生存诉求与亲缘关系依赖、城市陌生人排斥与熟人情感认同的反复博弈中,儒家伦理支撑下的熟人关系秩序在重构与变异的冲突中不断得以延续,血缘、地缘等传统熟人关系的内核以多种形式展现出来,并在实践中被赋予新的运作逻辑与表征。

社会关系规则与秩序不是独立的体系,而是特定经济方式、生产条件、制度形式、文化习俗下社会成员的合作方式,同生产实践需求、生活特定境遇紧密相连。在流动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通过正式制度体系嵌入城市社会,也无法以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获取生存资源,更无法从官方授权的正式组织网络中获得社会认可。在这种境遇下,传统熟人关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社会资源、融入城市社会的黏合剂。孤立无援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与变动的生活实践中,血缘、地缘、朋友等熟人关系仍是这一群体交往和工作中倚重的重要关系,不仅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归属与认同,也被赋予了更多理性化的个体诉求。但是,在现代化、理性化以及现代市场契约与规则的多重切割下,在个体生存诉求与外在市场规则的相互影响下,理性与规范等理念已进入新生代农民工的熟人交往场域,他们的熟人交往实践与传统社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熟人交往中伦理特征逐渐弱化,以情感认同为路径,理性逻辑、平等逻辑、情感逻辑、交换逻辑等正在进入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互动实践中。

在代际关系中,虽然持续流动的生活图景变革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聚少离多,成长中的亲情分割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父母的情感依赖,持续的民工潮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拆分式的劳动力生产模式。但基于惯习延续、代际责任等因素,对父母的尊重以及亲情归属等父权制模式仍然是代际秩序的基础。由于成长中亲情的弱化、长大后对个性独立的追求、现代文明对传统伦理的冲击等,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的代际互动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代际关系之间,除了亲情的延续,交换逻辑已经以变化了的形式渗入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交往中,并且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自主性的增强,父母权威日渐衰落。一方面是父母担心“老了是否还能指望孩子”,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赡养父母态度的不坚定。传统的代际责任虽然还存在,但是父母与子代互动中的情感逻辑随着民工潮导致的亲子分离以及子代打工后的聚少离多逐渐弱化。权威丧失、义务淡化、情感疏离等代际关系表征正在挑战着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代际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与漂泊虽然会打破原有的地缘、亲缘关系,但是在城市生活中也会遵循熟人关系规则重新复制乡土链接,尤其是进入城市社会初期,会依靠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提供就业信息、社会支持与日常帮助,通过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获得归属认同与人际信任。由于空间的隔离,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同亲戚交往的伦理道德指引已经淡化,但是基于就业诉求和空间距离接近,新生代农民工与所处同一地域打工的亲戚交往却会增强。虽然单纯的亲缘伦理责任弱化,但是基于生活实践的诉求,亲缘情感认同却是强化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对于形成紧密交往圈与互助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同熟人交往的行动实践中,传统熟人关系产生的情感认同以及关系信任依赖是新生代农民工熟人交往的核心要素;信息沟通、社会支持的个体生存诉求是新生代农民工熟人交往的生存需要;契约观念、规则意识、市场规则、交换逻辑是渗入新生代农民工熟人交往的认知图谱。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时间的延长,工作场景的科层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契约规范使得他们的理性意识逐渐增强,交换逻辑、规则意识、开放观念使得他们在与熟人交往中的理性要素逐渐增多。交往规则与秩序从不会凭空产生,它同特定情境下的生产、生活条件紧密相连,同时还会受文化惯性的影响。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场景中,受现代个体主义的影响,这一群体追求个体权益、人格独立与人生价值的倾向日趋强烈,“个人主义”的诉求正在瓦解着传统的儒

家伦理所指代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一方面是基于生存环境要求对于熟人关系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于个体利益的追求。在当今的人际交往实践中,形成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以血缘、地缘关系等传统关系为路径,以满足个体利益为指向的工具理性与道德弱化的交往规则。

结语: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有社会个体的交往方式,现代文明催生了社会成员平等、自由的观念,城乡流动改变了传统社会关系在社会成员生活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机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成员人际交往的变迁样貌。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境遇强化了这一群体的个体理性特征,自由、平等的诉求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普遍主义的现代规则理念,成长中的场域变迁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传统关系的疏离与弱化。但是儒家文化仍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有着流变性的影响,微观生活环境形成的熟人社会交往惯习,作为行为倾向系统,在陌生人社会中不断得以延续与重构。在与陌生人交往中,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契约型信任,更缺乏对陌生人的普遍主义道德。在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生存与归属诉求在实践中重构着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大大弱化了伦理责任却强化了工具性价值。在城镇化诉求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陌生人社会不仅需要这一群体形成与现代经济形式相适应的人际交往秩序,而且也需要用现代陌生人伦理指导这一群体形成平等、尊重、信任的人际交往习惯,更需要突破原有的地缘、血缘认同形成的情感偏向。但是在现实中可以发现,由于就业环境的限制、原有惯习的作用等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现状离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际交往规则依然有较大差距。

#### [ 参 考 文 献 ]

- [1][18]纪莺莺《文化、制度与结构:中国社会关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 [2]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页。
- [3]翟学伟《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载《社会》2016年第5期。
- [4]阎云翔《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 [5]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6]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 [7][15]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4-76页。
- [8]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 [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载《中国妇运》2008年第6期。
- [10]段成荣、吕利丹等《我国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问题与对策》,载《南方人口》2013年第4期。
- [11]陈雯《青年民工家庭“弱化”与婚育“催化”研究》,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 [12]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 [13]涂骏《论差序格局》,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 [14]任敏《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类型及其互动逻辑——试谈“差序格局”模型的扩展》,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 [16]龚长宇《陌生人社会的价值整合机制探析》,载《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5期。
- [17]张康之《“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邢哲)